



投稿记

□ 肖复兴

下我的第一篇小说《一件精致的玉雕》,文学组的同伴看完后觉得不错,像田老师一样,替我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再剪下一个三角口,寄到了《人民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是和共和国同龄的老牌杂志,是文学刊物里的“头牌”,以前在它上面看到的尽是赫赫有名的作家的名字。那时候,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轰动一时。如果不是文学组好心的伙伴替我直接寄出了稿子,我是不敢的。

没过多久,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冲着楼上大喊有我电话。电话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打来的,她告诉我她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小说收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准备刊用,只是建议我把小说的题目改一下。他们想了一个名字,叫《玉雕记》,问我好不好?我当然忙不迭地连声说好。能够刊发就不容易了,为了小说的一个题目,人家还特意打来电话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光顾着感动了,放下电话,才想起来,忘记问一下人家姓什么了。

1978年的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了这篇《玉雕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打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是谁,不知道发表我的小说的责任编辑是谁,那时候,我甚至连《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寄稿子的信封都是文学组的伙伴帮我写的。一直到20年后我调到《人民文学》,我还在打听这位女编辑是谁,杂志社资格最老的崔道怡先生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可惜,许以前辈已经去世,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

如果说文学作品有“处女作”之说,投稿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处女投”。真正属于我的“处女投”,是寄给《诗刊》的一组儿童诗。说是一组,其实总共就两首,完全仿照泰戈尔《新月集》写的。大概前面两次投稿都还顺利,壮了我的胆的缘故吧,在信封上写上寄《诗刊》编辑部收,把稿子装进去,再在信封右下角剪了一个三角口,就扔进了邮筒。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往外寄出的稿子,感觉真有些异样。那时候,大街上的信筒是老式的,绿色的,圆筒的,半人高,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往里面投寄信件,但都贴上了邮票的,这样不贴邮票,就剪下一个三角口,能寄到吗?我随后又马上打消了自己这样的小心眼的念头,以前两次寄出的稿子,不是都寄到了吗?你的手气就这么差?

那时,《诗刊》编辑部在虎坊桥,我每天从学校下班都要路过那里倒车回家。在他们编辑部的门口有一块大玻璃窗,每一期新发表的诗,他们都选出一些,用毛笔手抄在纸上,贴在玻璃窗里,供过往的行人观看。玻璃窗前总会围着好多的人,一行一行把诗看到底,那时人们关心诗,就像如今人们关心橱窗里的时装秀一样,文学离人们那样近。有一天黄昏下班路过那里,我忽然看见我的那两首诗居然墨汁淋漓地抄在玻璃窗里,题目改成了《春姑娘见雪爷爷(外一首)》。题目下面就是我的名字。最后一行,写着“选自《诗刊》1978年第6期”。我的心跳都加快了,玻璃窗里我的那些幼稚的诗句,好像都长上了眼睛一样,与我对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诗,也是我唯一一次发表的诗。

对于我,“处女投”和“处女作”的作用与意义相同,让我有了信心,也让我见识了世道人心,那些根本就不认识的编辑,让人触摸到并不敢忘怀的文学的良知善意。

就在我对投稿有了一些信心的时候,投稿开始不再那么一帆风顺。我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剑之歌》,是写当时在马德里世界击剑锦标赛上负伤勇夺银牌的击剑女将栾菊杰的教练文国刚。寄给几家,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这让我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质量打了问号。还是丰台文化馆文学组的同伴不服气,把退回的稿子换了个信封,转头要寄给《雨花》杂志,说栾菊杰和文国刚都是南京人,《雨花》也是南京办的,可能会认的。我拿过信封,自己给《雨花》杂志寄了出去。反正也不用贴邮票,就是在信封上剪个三角口嘛。或许,真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那一年冬天,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第二年春末的时候,我接到《雨花》杂志的一封信,要我速去南京改稿。正在上课,学校不准请假,只好熬到放假身去南京。我到南京的那一天是清晨,路上行人甚少,只见有一些老人躺在马路边的凉椅上乘凉。刚刚下过一点小雨,地上有些湿润,风很清爽。按照地址找到《雨花》编辑部,站在大门口,怎么看怎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想,是在电影里,这不就是当年蒋介石的总统府吗?心想《雨花》编辑部真会找地方。

接待我的是《雨花》时任主编顾尔镔先生。我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剧作家,写过话剧《峥嵘岁月》。他是粉碎“四人帮”后我见到的第一位作家,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面容可亲。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给我印象太深:穿着一条短裤衩,一件和尚领的大背心,摇着一把大蒲扇,和我在街上见到的那些躺在凉椅上乘凉的老人没什么两样。他让编辑先安排我住下,就住在编辑部旁边的招待所里,招待所旁边就是太平天国王府的西花园,热是热了点,风景十分不错。下午,顾尔镔先生来看望,对我说这房间太热,你晚上要是改稿子就到我们编辑部,那里电风扇多,也凉快些,便让编辑给我一把编辑部房门的钥匙。

那年夏天,南京非常热,每天趴在桌子上用两台电风扇一前一后吹着改稿,听顾尔镔先生摇着大蒲扇说些和稿子有关或无关的事情,然后到新闻街口闲逛,到鸡鸣寺吃小吃或到天王府的西花园散步,这确属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惬意的日子。它让我不仅学会了文学上的许多东西,更让我感受到由文学的真诚所弥漫的平和与温馨的氛围。1979年10月,我的这篇在顾尔镔先生指导下修改的报告文学,发表在《雨花》杂志的头条位置上。

那时候,文学是多么的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纯,就像那时没有雾霾、没有酸雨、没有沙尘暴的天空一样,让我呼吸顺畅。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编辑,都是沙海淘金一般从自然来稿中选择,没有一点如今见多不怪的机心巧智与人际关系,以及由此编织的蛛网一般的网络。认真、热情、单纯、简单,就像当年我爱用的碳素墨水洒在纸面上一样,黑是黑,白是白,清晰且爽朗。很多作者都曾和我一样拥有过相似的经历,因为我们毕竟身处同一个时代。我分外怀念那一段年月。

有意思的是,我从南京修改《剑之歌》回到家后的第3天,我的儿子出生。如同小鸟啄破蛋壳似的,他睁大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对于他陌生的世界,和对他对我们一样崭新的时代。

现在出门,多数时候我都会选择飞机,腾云而去,驾雾而归,省时省力。但若要点一下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最多的还是地上跑的。可谓回顾所来径,车轮滚滚。

生平第一次出门,坐的交通工具是长途汽车。1958年夏,不幸被打为“右派”的母亲要去偏远山区“劳动改造”,只好把3个月大的我送到乡下托付给父亲的奶奶——我的祖奶奶。她左手挽着包袱右手抱着我,乘长途车从杭州到绍兴,再从绍兴到嵊县。父亲的老家在嵊县崇仁镇,叔叔推着独轮车到长途车站来接我们,我坐一边,行李坐另一边,独轮车碾过古镇青石板路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存活着。独轮车应该是我坐过的第二种车。



车轮滚滚

□ 裘山山

3年后我再坐独轮车离开老家崇仁,又3年后我便坐上了火车,一个轮子变成了几十个轮子。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迁徙到了父亲工作的石家庄。到火车站后,一辆军用大卡车把我们一家和简单的行李,拉到了父亲所在的学院。火车和“大解放”,成为我坐过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车。

然后才是两个轮子的车。母亲从杭州到石家庄时,带去了一辆她上班用的女士自行车。那辆车非常重要,我们住在紧邻田野的郊区,大院子里只有一个服务社,很多东西需要进城买。一到周末,父母就把需要买的东西开好单子,然后选一人骑车去市里购买,大包小包的,前堆后驮的,很是起作用。那时经济拮据,我们几乎没有逛过街。

有一回父母突发奇想,要骑车带我和姐姐出门玩儿。父亲借了辆男式自行车,搭我,母亲用她那辆女士车搭姐姐,一家四口从石家庄去保定,看正定大佛。从石家庄到保定,往返差不多有70公里,那时路也不好,但父母硬是用自行车带着我们姐妹俩旅游了一回,真了不起,应该是最早的“自驾游”了吧?自行车,是我“坐过”的第五种交通工具。

姐姐上中学后,学校离家远,那辆自行车便成了她的交通工具,她每天骑车去学校,早出晚归,自行车后面夹着饭盒,看上去很潇洒。我羡慕得不行,也想骑,可她碰都不让我碰。我气不过,在她骑上车时,冲上去扭车钥匙,只听咔嚓咔嚓一串的响声,卡断了好几根车条。此行为完全属于损人不利己,让我挨了一顿臭骂。

在石家庄我还坐过一种车,记忆非常深刻:马车。我相信坐过马车的人一定很少。我们大院在郊区,围墙外的马路是名副其实的马路,每天都有马车来来往往,一匹或两匹马拉着大板车,上面是粮食或者蔬菜或者干草。偶尔碰上空车的时候,我们就跳到板车后面捎个脚。遇到脾气好的车把式,笑笑而已,遇到偏头倔脑的,就会用各种办法把我们颠下车去,甚至故意用鞭子把我们抽下去。我的胳膊就曾惨遭鞭撻。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搭乘”过几次。那马一边走一边甩着尾巴,勤劳的车把式会下车来捡,懒惰的就任其堆在马路边。我们学农的时候,就跟着马车跑,捡那热乎乎的马粪,攒起来送到农村。

1997年我重返石家庄时,院外的路上已看不到一辆马车了,全是机动车。在速度加快的同时,噪音和危险也大大增加了。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山城重庆。离开石家庄时,母亲听说那里完全不能骑自行车,便将那辆劳苦功高的自行车留在了石家庄。我和姐姐就只能走路上学了。偶尔出门,就坐大卡车。虽然从我们住地北碚到重庆市区,车票也就两三块钱,但对那时的我们家来说,也是大钱。我们尽量搭顺风车,就是部队施工用的那种装土渣的,而且总是站在车厢上面,任大风吹得脸颊生疼。

后来当兵,依然是经常坐解放牌大卡车。连队只要集体外出活动,就是大卡车拉着。

一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学会骑车,才有了第一辆自行车。那是部二手的女式飞鸽,墨绿色。那时买自行车要凭票,只好买二手的。我当时在成都郊区凤凰山,每个周末骑车进城,往返三十多里路,路上我必须和大货车、拖拉机以及摩托车等并肩前进,曾经被撞两次,还好都没致命。有爸妈的勇敢精神垫底,我就这么往返了3年。

生孩子的时候,我坐过一种很特别的车,成都人称之为偏三轮。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成都满大街都是那样的车:就是在自行车旁边安一个独轮车,专门用来搭老婆孩子的,所以该车也被叫做“耙耳朵车”。我肚子鼓到像袋鼠一样时,丈夫勉强安了一个(没面子啊),所以我有幸坐过两三回。等我一完成生产任务,他便赶紧拆掉,难看啊。

有“偏三轮”肯定就有“正三轮”。那时成都的出租车少,公交车也少,“正三轮”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正三轮的车价与出租车不相上下,很贵。这样一来,偏三轮很快走出家庭,成为运输工具,同样的路程,正三轮要十元八元的,偏三轮给两三元就够了,差距很大。偏三轮里还有一种老人车,就是小三轮,我也坐过,价格跟偏三轮差不多。还有一种被称为“火三轮”的,就是机动三轮车,我也坐过,速度比三轮快,也便宜,就是噪音大,且不安全,很快被取缔了。

看看,光是三轮车,我就坐过四种了。现在成都街上已经看不到三轮车了,更看不到“偏三轮”“火三轮”什么的了,说实话,虽然看着体面,却没有那个时候方便。对了,还有摩托车。

我第一次坐摩托车是当兵的时候,我们营有一辆军用摩托,三个轮子那种,很大。负责开摩托车的老兵是个湖南人,他专门负责骑摩托去送文件。我考上大学离开连队时,连里派他骑摩托送我去火车站。我坐在侧面那个斗里,箱子捆在后面的轮子上,感觉很爽。

后来又体验了两个轮子的摩托。上世纪90年代中期,省作协在郊区一个山里开会,我因有事没能坐大巴一起出发,就搭了一位作家的摩托前往。那辆摩托车是他用稿费买的,算是早期的“私家车”雏形吧。记得当时是黄昏,沿途炊烟袅袅,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几十里路一个小时就到了,留下了颇为美好的记忆。

说汽车吧。这应该是我坐过的最多的交通工具了。从卡车到大巴,从吉普到越野,从轿车到跑车,从奥拓到特斯拉,也算是体验过不少了。而且汽车(轿车)也是我唯一会驾驶的交通工具。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北京吉普。上世纪90年代,我曾坐北京吉普在西藏边关跑了很多次,路很颠,灰很大,吉普车密封不好,我坐在车里必须用纱巾当口罩捂住整个脸。但下车时,鼻孔里仍是满满的灰尘,沙眼也更厉害了。

后来部队条件好了,北京吉普逐渐被越野车代替,有国产的山鹿、燕京、勇士,还有日产的三菱、丰田等,2000年后我再去西藏时,看到路上跑的全是高档越野车,一辆北京吉普都看不到了。最关键的是路好了很多,一些泥泞不堪的路硬化了,一些非常难翻越的大山贯通了隧道。原先从拉萨到林芝,要颠簸一整天,十几个小时,现在5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实在是巨变。

奇怪的是,虽然汽车坐得最多,但第一次坐轿车的记忆完全没有,第一次坐地铁的记忆却很深,也是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地铁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让我喜欢,我后来出差去北京,总会找机会去坐一坐地铁。那时到北京出差,要么选择地铁,要么选择“面的”,黄色的中巴,上哪儿都10元,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行走,实在是很实惠。打小出租的话,随便去个地方就得二三十。不过“面的”没存在几年就被取消了,大概有损首都的面子。现在的北京出租车不但全是轿车,而且还是好轿车,虽然贵,依然不好打。

多少种车了?有点儿数不清了。如果说得再细一点儿,我还坐过电瓶车 and 缆车。不过缆车比较特殊,没有轮子,基本上悬在空中,说它是陆地交通工具好像不准确,但说它是空中的,又太低空了吧?

我还坐过一种很少人坐过的车,就是井下的运渣车。上中学时,学校组织班干部去煤矿参观,下到很深的井里,坐了一段运渣车,当时只有13岁,留下的记忆就是紧张。

火车,曾经是我每年必须乘坐的交通工具。读大学时,每个寒暑假回去看母亲,从成都到杭州,要在车上晃50个小时,见到母亲时仍在头晕。虽然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我知道那铁路来之不易,也是被坐烦了。今天总算有了高铁和动车。速度大大提高,再也不会坐火车坐到腿肿了。

随便这么一盘点,我坐过的地面交通工具(除去飞机轮船)至少有20种了吧?好像在现有的车里,我没坐过的大概就是磁悬浮了。这个也不难,找个机会坐一回就是了。

虽然不清楚我们国家现今的汽车人均拥有量,但只要看看每个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情况,就知道发展有多快了。更多的城市已经开始把轮子滚入地下,造地铁。

从车轮的变化,就能看出国家的变化,整个社会好像安了轮子似的在往前跑。但过于快速的汽车增量,令人亦喜亦忧。

就我个人来说,伴随我时间最长,给我最大帮助的还是自行车。我工作期间,丢过的自行车总数是12辆,一打,以至于后来不愿意再买了。自行车之后,涌现出大量电动自行车。这种车我至今没骑过,但常常在路上被它吓着,它速度快,却没有声音。电动车发展太快了,已经多过自行车了。许多上班远却买不起汽车的人,都愿意选择它,只是安全令人担心。所以,当共享单车兴起时,我特别高兴。尽管发展初期产生了不少负面问题,但我还是由衷地喜欢。从三年前加入到现在,我累计骑行了约800公里。我是个以宅为主的人,那些天天上班的,早就几千公里了。骑共享单车不止是省钱,也不止是环保,还可以锻炼身体,锻炼反应能力和平衡能力。所以我由衷地希望它能逐渐完善,永远保持下去,愿我们国家在车轮滚滚的飞速发展中,保留下最质朴的生活。

